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丛书
GLOBALIZ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series

西方主义

■ (美) 陈小眉 著
冯雪峰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014038920

G0

92

南京大学“95”三期改 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西方主义

■ (美) 陈小眉 著
冯雪峰 译



G0
92

 南京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7270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主义 / 陈小眉著; 冯雪峰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丛书)

书名原文: Occidentalism

ISBN 978 - 7 - 305 - 12054 - 1

I. ① 西… II. ① 陈… ② 冯… III. ① 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5334 号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2nd edition by Xiaomei Chen and Dai Jinhua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rights © 2014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2-18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丛书

书 名 西方主义

著 者 陈小眉

译 者 冯雪峰

责任编辑 郭艳娟 施 敏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48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字数 318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054 - 1

定 价 50.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件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014038250

目录索引第三“288”学大京南

目录大重组基究研点重学研会社学哲社高表工

目录组研工研社学哲社高表工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陈小眉（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

Erika Fischer-Lichte（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Mette Halskov Hansen（挪威奥斯陆大学）

Torbjoern Loden（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王 宁（清华大学）

王守仁（南京大学）

许 钧（南京大学）

尹晓煌（美国洛杉矶西方学院）

周 宪（南京大学）

/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丛书总序

全球化,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话说,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推动全球化、全球意识和全球联系的是一些结构性的社会力量,比如:技术革命、发展的资本主义、文化取向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也出现全球化的大趋势。但是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全球化带来文化的同质性。文化全球化至少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与物品在全球扩散同步的观念在全球的传播;来自不同区域和文化中的人在交往当中形成的新的规范和知识;以全球作为认识参照的新的思维方式。在这些基础上形成一种世界文化,影响和作用于任何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从时间上讲,文化全球化在20世纪后半期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发展程度不一样,对不同社会中不同人群影响程度不一样。全球化没有终止文化的多样化。当不同文化相遇时,产生了众多新的文化形式,比如世界音乐、混合烹饪等。

001

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改变了我们了解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方式。在全球相互联系和依存的情况下,如何认识文化间的差异性在方法上具有了新的特点。那些与本土环境密切相关的文化体验长期以来在语言中不断得到塑造和锤炼,因而具有显著的独特性,但是今天在全球交往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对它们进行反思和重新评估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我们意识到对于文化差异的认识不仅仅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的掌握,而且要在全球文化的流动性和碎片化过程中结合个人与群体的经验来形成。文化差异不再是固定和僵硬的,而具有相当的弹性。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和多重的。由于这些互动的不均衡性产生了新的文化差异。在这种多样性当中,文化之间的疆界慢慢消弭,全球的文化联系得到加强。

研究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的立足点是中国的视角,也就是从中国的现实和经验出发,着力分析中国文化面对全球化浪潮所产生的问题和可能采取的策略。全球化分为经验、理论与政策三个方面。经验方面包括气候变化、因特网、人权,

理论方面包括文化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政策方面包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全球化的性质、速度、方向和后果是可以改变的。如何在文化上应对和挑战全球化,我们需要面对和思考一系列问题,比如: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吗?中国正在经历怎样的文化转型?“中国性”或者“中华性”的文化版图有什么新的特点?

本丛书希望综合国内外学术资源,包括一些华裔学者的研究,就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的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探讨。目前阶段的研究计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跨国民族主义、全球化与文化互动。从理论上探讨“全球化”、“跨国民族主义”、“西方主义”等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和衍变,讨论全球化、反全球化和本土化对于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影响。二、中国的跨文化改编与表演。从中外跨文化的视角,研究戏剧、文学和电影的跨文化改编和表演问题,考察和分析民族、性别、种族、身份、生态等如何在当代文学、戏剧、电影以及日常生活的表演中被想象和再现,着重研究民族文化、主体性、权力之间的关系,系统介绍和研究“跨文化表演”的新成果、新观念和新实践。三、全球化、翻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足以证明,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出现了亟待赋予阐释的新特征,即翻译成为一种社会分析和政治介入的方式。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引起越来越强烈的关注。四、全球化与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外文学关系。在全球化和跨文化语境下重新审视中国和外国文学的交流与互动的关系,侧重考察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各国的译介与接受,从跨国民族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各国对当代中国文学的阅读心态及其文化立场与期待,进而更好地推介当代中国作家,提升当代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五、当代英语多元化与中文的国际化趋势。在全球化时代,英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出现新的特点,比如:全球多样化的英语,尤其是前殖民地国家英语从边缘开始进入并影响主流。在一些英语非母语的国家,双语或者多语现象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国际上正在掀起中文热,中文教育受到追捧。跨语言现象、语言政策、全球英语与本土化等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是面向未来的重大命题。愿“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丛书给读者们带来一些新的知识和体验!

何成洲

再版前言

世纪之交，中国似乎已不再是一个绝对异数。至少在全球的版图中，中国已成为一块难于镶嵌但毕竟可以为之找到位置的拼图块。似乎在“后冷战”时代，经济利益、全球市场的争夺或文化差异，已成为欧美世界关注中国的更为重要的着眼点。似乎我们可以仅仅在全球的“后殖民”语境之中、在后发现代化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层面上来讨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但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异数”。因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变迁，始终联系着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历史；在新时期社会实践之中，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始终是必须的、正面或反面的历史与现实参照。用笔者所偏爱的说法，对于“新时期”至今的中国社会说来，50年代至70年代，始终是一笔难于度量、清算，也被拒绝度量和清算的巨大的遗产与债务。时至今日，毛泽东时代作为“另类现代化”（姑且使用这一多少有些可疑的说法）实践的意义已获得了清晰的指认。如果说，对于欧美世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是封闭在“红色铁幕”后面的“东方异类”，那么，中国，却始终不曾真正自外于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反抗的历史。但必须指出的是，凸现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作为另类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却并非意味着取消或替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这一思考视域与历史事实。尽管我们无疑可以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脉络中，有效阐释百年中国的变迁，但社会主义中国，或曰毛泽东时代，却不仅提供了一段难以在单一的文化逻辑——现代化、另类现代化或冷战——中予以清晰勾勒的历史，而且时至今日，这段历史仍然是构造着今日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政治文化实践的内在因素之一。正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与曰“改革开放”的介入全球化进程的交织，形成了世纪之交极为繁复多端的中国社会现实。因此，至少在笔者的视域之中，讨论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后社会主义”或许是一个比“后殖民”更为贴切和有效的概念与范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与思考层面上，陈小眉的《西方主义——后毛泽东时代的反话语理论》，作为一部早在1995年就已问世的英文学术著作，显现了它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作用。

一、《西方主义》vs《东方主义》?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①的发表,无疑是美国或曰欧美学术界的一件值得记忆的事件。这无疑是一部富于洞见的揭秘之作:揭示出所谓“西方”与“东方”间社会、文化巨大差异、对抗,与其说是“人类文明史”的基本事实,不如说,它始终是“西方”/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成功的话语构造,一个“西方”自我中心之像所必需的“异己”(the other)之镜,一个欧美人文社会学科建构之中的内部事实;在欧美世界内部、现代西方的学科内部,《东方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批判空间与自指、内省的路径。它不仅是对欧美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最新贡献,而且作为来自第三世界学者的声音,它在对欧美中心的文化建构构成某种颠覆与挑战的同时,参照出西方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传统自身,仍是局限在欧美中心/白人中心的事实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主义》在英语世界中,标识出一个(或多个)渐次响亮的第三世界学者的音域。因此,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学者陈小眉1995年初版的专著《西方主义》,便势必被纳入《东方主义》所开启的学术脉络之中。同时,在为萨义德所“破译”的“西方”/“东方”二项对立思维的惯性中,《西方主义》一书相对于《东方主义》势必被冠以直接对话或再度挑战的色彩。

002

毫无疑问,在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世界的学术写作的理路中,在萨义德所开启的、将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立场用作颠覆性思考的重要资源的层面上,《西方主义》确乎与《东方主义》构成了承继或对话的意义。但与其说,《西方主义》是对《东方主义》的直接回应,不如说,它只是一次以多重脉络相连接的潜在对话。如果说,《东方主义》以颠覆性的姿态揭示了所谓“东方”只是欧美文化内部作为异己者的话语建构,是作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副产品的学科建制,东方学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产物;那么,《西方主义》所关注的,则是“西方”在新时期中国作为有效的政治文化实践的话语意义。在陈小眉所展示的文化图景中,似乎是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重演,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的“西化”过程,固然有着相当真实的“体制转轨”的真实内涵,但作为一种文化/话语实践,却呈现为一种深刻而自觉的文化误读:即,借重某些西方(主要是欧美18

^① [美]萨义德(Edward W. Said):《东方学》(*Orientalism*, 一译《东方主义》), Kazi Publications; January 1996, Vintage: October. 1979. 中文译本,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世纪、19 世纪的)文化素材,以建构一种有效的本土政治抗衡的话语。如果说,《东方主义》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成为内在于美国/欧美文化脉络内部的“外在”洞察与揭秘,那么,《西方主义》的意义则在于它以某种不简单认同美国(中国学或非中国学、主流的或左翼的)学术脉络的“外在”姿态,尝试揭示 80 年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内在文化理路。

此间,一个为笔者深刻而不无痛感地体验着的文化事实或曰文化困境是,一个持有或左翼、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身为本土的、或关注本土的域外知识分子说来,面对当代中国,我们不可能轻松地脱身于一份社会立场、理论和话语资源的艰难困境。在清醒地意识到全球资本主义化的酷烈进程,意识到伴随跨国资本的经济渗透与文化侵略而到达第三世界的、新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掠夺和剥削的事实,意识到中国介入全球化进程所伴随的第三世界化和贫富分化过程的同时,不可能因此而忽略或无视当代中国历史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特定时期、不仅针对特定社群的暴力与剥夺的事实;不可能因此而无视在对全球化过程的介入中,第三世界国家权力所出演的多重角色。全力推进曰“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权力因而日益深入地形成与欧美资本主义势力及跨国资本的种种合谋,与此同时,却不时因某些民族国家及权力集团的利益与跨国资本和帝国主义势力经历着冲突,甚或抗争。而今日中国,囿于冷战年代历史定位与“身份”的沿用,亦为了保持合法性叙述的连续,或许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某些昔日社会体制性的元素得以保存。在国际场景中,中国始终处在一面自觉跻身于全球化的进程的努力之中,一面仍置身于不得已的“后冷战时代的冷战境遇”之内。因此,对本土的或关注本土的知识分子说来,我们的社会文化立场,不可能是某种相对单纯的欧美社会批判立场或左翼传统的直接搬用。自觉地继承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同时冷静地清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债务,正面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化的进程,同时拒绝妥协于现实权力政治,这使得我们必须采取某种社会批判的、同时是本土具体而深入的历史与现实的批判立场。这远非某种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类似立场的选取与困境的呈现,不是源自别一种欧美文化资源:后结构主义所提供的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资源,也不仅是一种单纯的面对欧美强势文化的本土反抗,而是出自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的直面和承担。笔者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与认同中,注目于陈小眉的《西方主义》对于 80 年代中国文化的分析,以及因此而引发出的对“西方主义”作为一种

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实践的讨论。

作为一种不同于《东方主义》的、与《东方主义》的潜在对话，陈小眉对 80 年代中国文化中的“西方主义”讨论，凸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 80 年代中国本土繁复的文化情境的一个侧面，那便是西方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话语建构，作为 80 年代中国重要的抗衡性的社会文化实践之一，与官方说法、权力秩序之间的复杂纠结。正像陈小眉在她的《西方主义》一书中对七八十年代之交、对 80 年代中国所做的富于洞察力的描述，一如大部分第三世界，或曰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中，“西方主义”，与其说作为某种具有稳定性的权力话语，不如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实践的场域。其充满矛盾、冲突的话语建构过程，始终不仅是用以呈现和建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的材料，不仅经常与政治的或文化的自我“东方化”策略相伴随，而且始终是政治实践中一个重要而变动不居的元素。除却在特定的危机情境（遭受军事侵略、残酷的殖民统治或独立建国的岁月）之下，所谓“西方主义”，或曰文化西方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历史情境中，始终是不断为多种政治力量所借重（以参照其欧美原本“误读”的方式）的重要政治文化资源之一。如果说，这一事实本身，仍毫无疑问地印证了文化帝国主义霸权的存在，那么，它不仅因这一霸权的无孔不入与无所不在而成为一种别无选择之选，而且在不同第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实践中，始终充满了远为丰富繁复的主观能动性与时时性因素。事实上，间或伴随着自我东方化，或曰自我东方主义（用以成就现代化逻辑的本土版，成就“传统的现代化”之艰难命题的特定表达；用以建构“特殊性”、“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性”的叙述，以支撑其自身的、参照着“西方”却不同于欧美世界的现实秩序及合法性论述）的西方主义，不仅可能是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用以实现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论证，用来构造新的统治逻辑和结构的有效方式，它也可以用于实现对帝国主义政治军事侵略、经济渗透与剥削的有限的“民族”抗议和反抗；它不仅可能是某种现实秩序和权力话语，它也可能为本土的抗衡力量所借重，用来反抗现实暴力和阶级、性别和民族压迫。它可能是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游击战的多种弹药之一，也可能是民众抗议的一种武器。

004

二、中国：历史与现实

但多少有异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种文化西方主义，不仅经由殖民主义及

其反抗的历史,而且经由与社会主义历史的复杂纠缠,更为深刻而多重地交织在当代中国文化及其话语的建构过程之中。首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毫无疑问有着它西方/欧洲的历史“语源”,尽管同样毫无疑问,此间经历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东方”改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张扬的国际主义旗帜:“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使得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内在地排除其西方主义的内容及其特征。但是,社会主义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事实上成为确立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功尝试。遭遇冷战时代,面对强大的欧美资本主义阵营,面对着“东”“西”方的严酷对峙,遭遇政治、经济封锁的现实,同时很快面临着中国与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盟关系的破裂,面临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深刻矛盾与冲突,因此,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只能采取“独立自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国际政治策略。换言之,尽管冷战的历史,是反省今日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参数与必须直面的现实思维结构之一,但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彼时的中国,事实上真切地跻身于某种三项而非二元结构之中: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同时对峙于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中国所可能选取的位置只能是“序号第三”的世界“边缘地带”。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始终多少借重着某些自我“东方化”的方式(Self-Orientalism):强调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以重申界说,进而确立强大的、牢不可破的国家秩序。一如陈小眉颇为明敏的观察,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尤其是60年代以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述,始终伴随着某种自我东方化与本质化的西方主义表述,或者不如说是有效的自我/西方想像:崛起的东方巨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强盗”,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资本主义体制,腐朽没落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人民的苦难。结合着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话语,类似表述转移为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在一幅三分而非二元的世界“地图”上,中国被自塑为第三世界领袖。在“边缘地带”的中心想像中,中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革命的策源地”、“红色的心脏”。于是,它在构成以中国及第三世界——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的同时,间或成为国家民族主义的重要而有效的组成部分,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暴力因素,成为遮蔽体制内压抑机制的有效方式。

因此,当历经10年的“文革”终告结束,70年代至80年代之交,伴随着新时

期的开端,别一种本质化的西方主义、西方想像——启蒙主义,历史目的论,民主或自由,开始被知识分子群落用作一种有效的政治抗衡性的话语。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内部的社会语境之中,反抗帝国主义的话语,曾被有效地用以构造一个外在的敌人、他者,因而抹去了事实上已成功地内在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之中的/政治文化上西方主义的因素;而新时期的开端,知识分子群体所选用的政治抗衡方式,则是以一种充分东方主义化历史描述:作为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之延伸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历史的“超稳定结构”及其“历史循环”,来完成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否定和绕过。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否定,以及渐次启动的“现代化”的进程,仍然是在原有体制内部开始的,因此,此间尖锐的社会冲突,便必须采用一种“文化转喻”的形式;西方主义对东方主义由此而成为一种有趣而恰当的选择。如果说,6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某种自我东方化与本质化的西方想像,曾助力主流意识形态成功地绕过了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话语的内在冲突,绕过了冷战年代,中国所处的并非两极或二元的结构位置(为欧美世界所封锁,同时与前苏联东欧集团相对立),那么,新时期中国所采取的西方主义对东方主义的“转喻”的方式,则成功地直面并绕开了现实政治的重压和冲突。当然,它因此必然而遮蔽了百年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历史,遮蔽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作为现代化历史的一部分,同时遮蔽了为七八十年代到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群落所借用的西方主义文化资源事实上原本内在地结构在现当代中国文化之中的基本事实。

一如陈小眉在《西方主义》一书中所表达的观察,80年代,中国文化中的西方主义,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抗衡话语的表达,无疑针对着中国的社会现实;但与其说它是一份直接为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声辩的主张,不如说,它只是借用业已存在于当代中国文化内部的欧美文化资源来勾勒一个“新的”、不同的理想图景,用以参照当代中国社会的“症结”。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原本内在地借重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欧美,主要是欧洲的文化资源(当然采取了某种有效移置的方式),那么,新时期用于抗衡目的的知识分子的“西方主义”的话语建构,则是对同一文化素材的颠倒运用;尽管它采取了某种“勘误”或“证伪”的姿态。其建构一种抗衡话语、成就某种反抗姿态的政治文化诉求,远远超过了其还原西方世界“真实”的努力。于是,它必然再度成为一个“新”的误读版。更为有趣的是,不仅是作为一种策略,类似西方主义的理想社会图景与新的

社会政治解决方案的提供,仍在相当大程度上参照并借重着主流到70年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理想社会表述。它剔除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性别与种族事实,在普遍富裕与社会财富的“涌流”的图景之上,凸现了社会民主体制。而此时此刻的民主表述,并非尚未成为对代议制政治体系或人权理论的表述,而呈现为对民众政治参与、自决与权利的自决——某种经过修订的、“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实践。间或是类似新的抗衡话语赢得了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同及受到拥戴的内在原因。作为对昔日主流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述的反转,新的西方主义的“启蒙话语”的建构,事实上凸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实践与资本主义历史的内在连接,但其政治诉求,却必然再度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相对于欧美资本主义历史的断裂意义。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显在的“时间差”的存在:由于用来构造新的文化西方主义的文化资源事实上来自于社会主义文化资源内部,因此,用来实践新的文化“启蒙”,用以勾勒“进步”、“民主”的西方图景的文化素材,仍大都得自于18世纪、19世纪的欧洲,有限的20世纪欧美文化资料,亦大都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不仅再度显露了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的文化西方主义,一如昔日官方的西方主义,具有充分的想像性特征;而且犹如一个不无残酷的嘲弄。如果说,昔日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有意识地滤去了20世纪欧美现实与文化的“噪音”和杂质,那么,正是这个时间差的有效建构,使得20世纪,尤其是战后欧美的种种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脉络上的对资本主义、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反省,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中必然的盲点,它因之而不致干扰了新的文化西方主义之理想国的建构和表述。正是这份时间差的存在,从侧面展露出一个有趣的事实:被封锁并拒于国门之外的社会主义历史,使得当代西方/欧美世界,对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仍是一份遥远而陌生的存在。尽管新时期的中国将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再度对世界(欧美)开启国门,准确地说是打开市场,但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和80年代前期,中国仍完全处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文化体制之中,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更多的是昔日“官方说法”中的一个外在的恶魔,一个知识分子新的话语建构过程中的想像甚或物恋的对象,而并非一个可以真切触摸的现实。文化西方主义,不仅是一面“异己”的想像之镜,用以映照“中国”自我的形象,它更多的是知识分子自我社会定位的坐标、言说的武库与悲情想像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西方主义的话语,将自身定位为反抗与颠覆的民

间力量,但一如陈小眉的洞察,在80年代颇为复杂的中国政治文化实践中,所谓官方的西方主义、(知识分子的)反抗的西方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间或代表民众(subaltern)的非官方的西方主义,事实上相当复杂地相互借重,彼此缠绕。如果说,类似抗衡性话语固然仍内在萦回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文化的幽灵,但它无疑更多地缠绕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更多地呈现为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策略性选择;尽管它将在中国对全球化的愈加深广的介入中,显露出为人们始料不及的面目。

三、言说者的困境与立场

笔者瞩目于《西方主义》一书,不仅由于陈小眉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对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对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的文化西方主义实践,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分析论述,而且瞩目于她在此书中所显现的言说者对自身位置和立场的自觉。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义》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展露了一个来自第三世界而置身于西方,准确地说,是置身于美国学院体制之中的知识分子对自身言说困境的警醒及内省中的一种选择。事实上,70年代至8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东方主义》问世、后殖民主义讨论展开之后,欧美,尤其美国学院体制内部的非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主流文化及学院、知识体制的正面批判,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文化潮流。如果说,它事实上成为对保持欧美批判传统的人文学院机制的延伸或补充,那么,它同时因第三世界视域的介入,而成就了新的文化批判角度。它间或成为对批判理论的批判。但是,此间一个显而易见的困境在于,一如欧美学院体制内部的批判知识分子,来自第三世界的非西方知识分子对欧美主流文化发言,并进而实践其文化批判或颠覆的前提,是对这一主流学院体制的接受和进入。换言之,如果说,基于第三世界的文化身份及其身为移民知识分子的社会体验,他/她真正的文化诉求,是对欧美思想学术传统及其规范的批判和挑战,那么,这一批判和挑战的前提,却首先是对其话语序列与文化生产逻辑的认同。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的欧美学院言说的有效性,必须参照接续着某种欧美文化的知识谱系。于是,对于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选择了社会批判立场的学院知识分子说来,他/她必须直面的困境在于,尽管其问题意识大都来自于本土文化经验或对本土的文化关注,但类似问题的提出,却必须纳入欧美学术史或曰思想

史的问题序列之中：他/她原本基于本土经验、间或希冀朝向本土发言的努力，经由学院体制——尽管很可能是学院边缘——与批判传统的整合，而成为这一体制或传统的新的、间或是别样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极端的例证中，来自第三世界的文化身份所成就的只是某种名曰身份政治的文化游戏，某种在特定的文化场域中化弱势为强势的身份/权力魔术，一份披挂着“有色画具”的、欧美学院内部的文化表演。

而相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欧美学院知识分子，一个具体的言说困境则在于，他/她们可能予以借重的欧美批判理论及其传统，都或多或少地联系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但如果他/她们仍以中国，尤其是现当代的中国的历史作为自己的言说对象或问题意识的出发点，那么，他/她必然无法绕过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反省和检讨，无法绕过（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与现实。于是，如果说，对本土文化经验的忠实与对本土文化现实的关注，使得他/她不可能简单认同或复制某种欧美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立场，那么，他/她所直接面对的欧美世界，他/她身为移民知识分子的文化经验，同样使他/她难于、间或无法真正认同欧美学院的主流叙述。双重抗议或反叛的位置，成就了他们的某种进退维谷的文化处境。这一深刻的文化困境，显然不可能为某种解构思路或后现代姿态所轻松解脱。

正是出于对这一深刻困境的认识和不同程度的体认，笔者珍视陈小眉在《西方主义——后毛泽东时代的反话语理论》一书中，所采取的言说位置与方式。这本英文学术著作，凸现出的是陈小眉对本土文化经验表达的重视。如果说，她无疑深刻体味着那份进退维谷的文化与言说困境的存在，那么，她选择的意义在于，拒绝为成就一份完美的美国学院表述而牺牲对本土文化现实的深入分析。尽管毫无疑问，类似选择并不能使她超离这一言说的困境，相反，可能因此而成为展示这一困境的例证；但她无疑表明了一种拒绝学院式的理论操练，拒绝文化、身份表演与游戏的姿态。

更为可贵的是，陈小眉在《西方主义》一书的撰写中，表现出一份多重意义上对多重的文化霸权和中心主义的反省和警惕：它既表现为对自己身为域外，准确地说是美国学院知识分子所可能陷入的分享西方文化霸权之危险的警惕，同时是对反抗欧洲中心霸权却因此成就了别一种文化中心主义表述的警醒。在对七八十年代之交、乃至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深入分析中，她同时关注中国

“精英知识分子”是否传达了底层民众的意愿。于是,《西方主义》一书或在不期然间成为一份新时期知识分子表述及其角色的检视和反省。对形形色色的文化霸权的警惕,对本土文化经验与现实的优先关注,对间或为知识分子话语所呈现并遮蔽的底层民众所投注的目光,使得《西方主义》一书,在笔者视域中,成为了另一层面上饶有兴味的例证。如果说,由于它所选取的讨论对象,它事实上成为反省和清算 50 年代至 70 年代历史债务之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其言说立场与言说方式,则成功地显现出这段历史之为精神遗产的巨大意义。或许正因为如此,《西方主义》一书在多个层面上成就了一份与萨义德《东方主义》之间的更为深刻和潜在的对话,但《东方主义》显然并非《西方主义》一书唯一的对话对象,甚至不是优先的对话对象。

四、共谋与共谋之外

一如陈小眉在《西方主义》一书中所做的深入分析,70 年代至 80 年代之交,文化西方主义作为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间或包含某种为民众代言的意愿)的文化策略,成为社会的抗衡话语系统之一。即使在彼时彼地,类似抗衡的或曰非官方的西方主义表述,便已然与官方的西方主义,准确地说是本质化的西方想像之间,呈现出彼此冲突,又相互印证、借重的特征。进入 80 年代中后期,曰“改革开放”或“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部。于是,在这一自上而下的历史进程中,便开始借重“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西方主义的抗衡话语,以建构其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为社会转型提供其充分的合法化论述。于是,一个不无怪诞又极为有趣的情形表现为,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群体延续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悲情想像,将自己定位为社会抗衡的边缘群体;一方面则是新主流权力与精英群体间的和谐共谋。如果说,政权的延续与体制的转型,使得新时期中国始终面临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表达困境和或明或暗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它必须借重知识分子所建构的文化西方主义话语以规避主流话语中的结构性自相矛盾。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也因此而在权力认可的现实与反抗权力的自我想像间,成为 80 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文化英雄部落”,获取了巨大的社会象征资本。如果说,类似情形渐次成为 8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地形图间的主部图景,那么,它却并非这幅图景的全部。

从某种意义上说,80 年代“告别革命”的社会共识的建立,必然渐次淡化直至

剔除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国际主义表述,并借重文化西方主义的话语所勾勒的“新”的世界图景,以重新定位中国位置。“中国”,不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成为一个边缘的但正朝向中心挺进的发展中国家。它确乎有效地粉碎了昔日世界革命图景中的中国中心想像,伴随着冷战结构解体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现代化的,或曰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国际位置的显影。因此,在80年代后期与整个90年代,某种国家民族主义的表述,成为权力机构借以避开体制冲突,建构新的合法性叙述,移置社会矛盾与危机,并成就其艰难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动员的重要话语序列之一。而一度成为有效的社会抗衡话语的、中国知识界的文化西方主义,则在对普遍主义的西方,尤其是前20世纪文化资源的认同与借重间渐次形成了一份新的世界主义情怀和文化想像。尽管对于中国知识界的主部说来,这份世界主义的想像和情怀,仍怪诞并和谐地并置于某种本土的民族立场及民族主义情绪,但类似分享着西方主义话语的国家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的世界情怀之间,却显影出似乎一度和谐的经典权力与知识界间共谋关系下的裂隙与冲突。如果说国家民族主义诉求大都用于整合并遮蔽内部的社会矛盾冲突,而并不妨碍其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和跨国资本势力媾和,那么,精英知识界的世界主义情怀和想像,尽管仍不时成为批判和抗争的武器,却无疑阻碍了他们直面中国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间所遭遇的现实。

011

不仅如此,一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及的,中国精英知识界于70年代至80年代之交所建构的文化西方主义话语,作为一种抗衡性话语,其所直面的正是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和压抑机制;它亦因此顺理成章地为新的权力机制所借重。新时期的中国延续着50年代至70年代的权力机构,同时凭借着这一机构推进着体制改革、社会转轨的过程。此间,文化西方主义与宏观政治经济学中的实用主义原则,事实上被用作绕开意识形态与体制冲突的有效方式;但权力机构的延伸和合法性叙述必需的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强调和反复确认,仍必然与80年代中国知识界包装在文化西方主义之下的政治诉求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裂隙和冲突。如果说,经历80年代的历史演进,权力机构与“精英”知识界事实上达成了某种默契和共谋,并共同实践了某种冷战式思维的倒置,或曰制度拜物教式的“宗教”的转移:由“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转移为市场万能,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围绕“现代化”未来想像及其许诺的霸权。但此间,似乎是同一社会解决方案间不同的路径的选取:是在经济实用主义的旗帜与现实举措之中,